

厌世的禅意

——论废名文学禅风的转变

席建彬

内容提要 废名文学的禅风纠结了农禅与文禅的精神差异,并不具备单纯的诗意特征。农禅更具乡土生活的质朴意味,文禅则指向生存体悟的雅化与抽象。偏离诗化的禅风转变涉及农业文化、文人传统以及现代生存方式等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不仅农禅、文禅的诗意是有限的,而且由农向文、文农交织的禅意也逐步陷入虚无、厌世的消极退变。趋于极端的风格变故意味着文学理想的受挫、幻灭乃至困境,表现出独特的美学个性。

关键词 废名文学 农禅 文禅 生活禅

席建彬,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571158

多年来,废名研究的禅学视野并没有明显的拓展。早年基本是在指证、确认废名为人、为文的禅意,经验、印象的痕迹较重。80年代以来,伴随现代文学史观的调整,逐步兴起的“废名热”仍然收获不大。由于废名“很难追踪”思路的文本晦涩、“难懂”,仍是小众化的研究,而禅学又因其“明心见性”、“空观万相”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成为殊难把握的泛化研究话语;至于诗化、超越的禅境等观点也似乎“不仅‘执一’而落于‘偏见’,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1]。面对一位“少数人的星光”但自有“永生的角落”的作家,显然不尽人意。文学世界的禅意是复杂、丰富的美学现象,泛化禅意多偏向作家作品虚泛的禅学色彩,并不着力具体、深入之处,而由于诗化一度构成禅学视野的主体,也不利对悲观、虚无等边缘品质的开掘。由此,指出农禅、文禅与废名文学的精神关联,深入禅风变化,在相对具体的文化诗学路径中展现禅意的渊源流向、风格差异以及美学效果,注重“复杂”与“内在”之处的影响研究,将有助于打破目前泛化、诗化禅的思路,厘清禅学精神的冲突与异变,将废名文学从“深玄的背景”、“田园牧歌”等背景中解脱出来,呈现交织了多元文化矛盾的美学个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中国诗性小说的叙事传统研究”(项目批准号14BZW137)阶段性成果。文中所涉废名作品均参见王风编:《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高恒文:《人类的“灾难”与“寂寞”——论废名诗歌的思想内涵与特征》,〔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1期。

在文人传统中看待废名文学的禅学精神,是目前常见的研究路数。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源自作家“很象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的诗学选向(《短篇小说选·序》),其实深层的原因在于当下的禅学理论多与识破尘缘、超然世外的隐逸禅风相关,“既以其超然之姿,明哲保身;也借其轻清祥和之美,抒发疏影淡月,几许销魂的浪漫情怀”^[1],沉淀了过重的文人情趣。藉此观照,利于清晰辨识雅化、抽象的文学韵致,彰显禅学精神与文人传统的资源关联。的确,诸如《桥》、《桃园》等作品清幽寒远的禅意正是文人生存体悟与审美心理的展露。然而,这类文人化背景在废名创作中其实并不统一和稳定。如果说诗歌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小说则基本如此,平俗、质朴的小农经济生活明显疏离文人生存,散发出农民文化色彩。沈从文说过,废名小说“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2],就表明这一点。显然,这一品性的存在不仅会导致由雅入俗、俗雅交织的风格转变,也会造成禅意观照的某些差异与分歧,进而可能突破已有视阈,带来研究变化。在文人传统中辨析废名文学的禅意,相对偏仄的“文禅”并不具备统摄、涵盖禅学精神的整体有效性,而“农禅”范畴的引入则能弥补这一点。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禅并非起始就具有文人色彩。按照杜继文、任继愈等人的分析,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发生的经济基础是“千千万万小农经济”,最初是“农民的佛教”^[3],只是后来才“由缁衣而流入士林”^[4],“从农民禅逐渐向文人禅转化”^[5]。与作为“士大夫的美学”的文禅相比,农禅的格调是迥异的。由于自身文化品位与心理的制约,文人禅往往存在遁避现实、归向自娱的出世倾向,追求幽深清远的田园、山林情趣,钟意萧条淡泊的意境感觉与人生体悟,“迎合士大夫的需要,普遍重视文采、机锋,乃至将禅化为斑斓文字,抒发或激昂,或抑郁,或悱恻的情感”^[6]。相对而言,文化素质偏低的农人则要质朴得多,生活主要是小农背景下的俚俗琐事,偶尔涉及的抽象觉悟也多为日常事相的表层关注而很少深入哲理层面,“澄怀观道”指向农业文化生存的朴实、自然与率性,沟通乡下人的朴素感知。事实上,废名的故乡黄梅就是中国农禅文化的发源地。远在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时期,黄梅禅宗就确立了农禅制度,“白天劳作,晚上坐禅,以农养禅”,开始了佛教在经济生活上的“重大革新”;曾经一度专属少数人的禅修逐步为日常生活中的随性参禅所取代,禅者也扩展为大众化的农民,“穿衣吃饭,尽皆佛事”、“运水搬柴,无非妙道”;摒弃了传统佛禅读经礼佛、静坐摄心的繁琐、庄重法门,而崇尚一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简化的行禅方式,成为农民化的“生活禅”。在禅学思想史上,黄梅农禅传统被誉为“对中国佛教的第一大贡献”,禅宗由此“彻底走进了世俗生活之中”^[7]。废名说过,故乡成就了他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姑且不论关于“禅宗祖庭”四祖寺、五祖寺的童年记忆,废名“相处最深的还是农民”^[8],民国二十六年秋读《涅槃》经而大悟,“旋即奔回故乡,从此在故乡避难。”(《致知在格物》)。《阿赖耶识论》始于“一个农家的宿牛的屋子里”,“种子义”也是“田间而悟得”的产物;深感农民

[1][4]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第313页。

[2]沈从文:《论冯文炳》,《冯文炳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3]任继愈:《农民禅与文人禅》,〔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1期。

[5][6]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导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7]刘立夫:《黄梅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黄夏年主编《黄梅禅研究》(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8]梅杰:《废名在黄梅》,〔北京〕《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3期。

向佛,“农民自己不做和尚,却是非常与佛教亲爱的”,佛教“给农民一种精神的休息”(《兼容并包与严格》);自以为“中国的读书人”有必要“好好地了解中国的农人,要好好地解救中国的农人”(《无题》)。乡土佛禅文化传统的影响、接受,加之生存感受上的农业化体验与认同,文学世界必然为农禅所熏染。以往我们虽关注黄梅地域文化之于废名禅意的精神缘起意义,但因为文禅的偏限并不看重个中的农业文化渊源,农禅也未引起足够重视。

废名小说和诗歌的禅风有异,禅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上的滋长,决定了小说主要是农禅与文禅的交织与演替,而诗歌则基本是文禅的“一枝独秀”。废名小说普遍保有淡化信仰色彩的自然化倾向,农禅是作为乡下人的生存哲学散发意味的,基于日常生活的世俗感悟是平淡朴讷的,即便悟道的深度体验也是简朴的,疏离抽象的逻辑思维。《浣衣母》、《竹林的故事》等普遍匮乏禅理觉悟,对李妈、三姑娘、四火这些乡下人而言,生活基本是事态性的自然流动,悲喜、贫苦虽会造成生存的动荡起落,但都是不得不面对的生命轮回,禅意是日常事相的率性流转与随缘自适,似乎只有“粗浅的逻辑”而进入不了深层的意义参悟。而《莫须有先生传》作为废名最具哲思的作品,禅理虽趋繁杂、晦涩,但“导迷向觉”仍不脱日常化的“乡间事情,举凡人情风俗”(《无题》),赶猪是“头头是猪,人人是土”(《莫须有先生下乡》),村姑担水是“每每乃其飘逸之出众而好看了”(《这一章谈到一个聋子》),堆稻的庄稼汉子让人觉着“是天下最成功的人物了”(《一天的事情》)……简化的体悟方式散布在世俗农村生活和日常劳作之中,仍不时闪现粗浅意趣,禅思也非始终玄妙。相对而言,前期废名小说的文禅色彩并不明显,平俗禅意少有文人情调,“隐约”闪露的清幽韵味,仅与文人美学隐约勾连,而《桥》等后期小说则予以强化,在普遍意义上,二者虽有融合,但禅风的具体生成主要源于叙述上的有所侧重。《桥》作为废名“了结”过去,“学会作文,懂得道理”,“认识一个‘创造’”(《自序》),已提供禅风转变意义,过多诗文、典故的汲用增添了作品的书卷气,小林与琴子、细竹的情感纠葛也寄寓了才子佳人况味,雅化的花草山水、灵泉修竹,更多融入才情风流的文人心理与品位。而相对“上卷”的文人趣味,下卷又明显转向心性退守与思索深化,普遍、随意的禅理觉悟终将挤兑文人化的感性自娱,彰显出沉郁的哲思气息。此时的小林已去除童心的真率而近乎悟道的智者,充满偶发性和跳跃性的思绪显得繁复而晦涩。小说每节以意象为题,暗含禅家“不说破”的机锋,刹那间的禅理顿悟常流于含蓄而突兀,正所谓“一落言诠,便失真谛”(《桥·天井》),又有着“文字禅”的匠心与玄妙。《桥》下卷中的禅理已从清幽禅境中凸现出来,禅意的形象体验与抽象觉悟明显分离,感悟的意绪氤氲转向深玄的事理揣摩与索解,有了强烈的理性识见意义。《莫须有先生传》的悟道多出自社会问题与人生观念的思虑和体察,“记事实、发议论”,趋重的抽象意味向着晦涩演变。不妨认为,废名是在逐步“参透”田园想象的虚幻,“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1],后期虽还存有一定小农文化色彩,但文禅已在不同层面产生影响,形成禅风的具体转化。相较之下,废名诗歌要简单得多,追求感性向理性哲思的凝聚,意象的丰富,体悟的跳跃、空白与非逻辑化,乃至如绝句般的遣词造境,已难以兼容农禅的诗意。精英化的诗歌是文人传统的主要艺术样式,与农业文化存在本质疏离,由于文人眼光与诗体的限制,基本属于文人化的人生想象与情思寄寓,诗意的“内里”是深幽低沉、寂寞枯寂的文人心态。废名诗歌不仅承续这一品性,而且切入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哲思。《空华》、《伊》、《墓》“望空观照”人生,一切皆为“虚幻”;《上帝的花园》中生命慰藉的寻求“好像白日里数天上的星似的”;《无题》、《自惜》、《梦中》的“微笑死生”也只是“镜里偷生”,“人间的光明也是一个梦”。看向生存深处,感受人生宿命般的空无,抽象的觉悟散发出文禅意味。

[1]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5页。

二

禅并非单纯的诗化一途。由于禅的历史分化与演替,沉积了不同人群的文化品性,虽说有意日常生活的超越,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诗意背离。农禅悟“道”相对表层、浅直,乡土的流俗、封闭也会侵蚀诗意的滋生,削弱禅意空间的开放性,造成文化适应与更新能力的贫弱;而文禅由于融进文人化的唯心体验与自我认同,易沾染文人的纤弱个性和苟安心理,带来文化上的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事实上,禅本身还是一种悲观哲学。佛禅以“空观”来超越现象世界的牵绊,悬置对象与主体的否定思维在走向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会消解自身,“佛教的‘空论’,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产生异议,被指斥为虚无主义”,“同样也易于堕入消沉悲观的泥潭而无所建树”^[1]。这种“近乎矛盾的情调”,不乏悲愁、怀疑乃至虚无等“消极”意义,“同它的怀疑论倾向相一致,它们都建立在佛教共有的‘无常’观,即破灭感的基础之上。所以即使表现最乐观的禅语,也渗透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哀愁。”^[2]缘起“性空”的禅化超越也多浸入现世的悲哀,“所谓看破红尘,消极悲观,无所作为”,“中国佛教在理论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受落魄和失意的士大夫的制约,禅宗也不例外”^[3],也即此理。

废名文学还属于一种感伤美学,似乎从未真正走入虚幻的梦境之中,总有“一种过滤人世沧桑的苦涩和沉重”^[4]。早在《竹林的故事》中,废名就曾期望读者能理出小说中的“哀愁”(《〈竹林的故事〉序》),而对于人们没有看出《杨柳》中自己的“眼泪”,“是怎样的用心”而感到失望(《说梦》),多年后又自承“我的苦闷,我的思想的波动”,“思想的激烈”,等等,都说明“本心”的不平静,难以趋附诗化禅意。废名的感伤不仅是一种否定性的文学情感,还包含着滑向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态势。相当意义上,从初期《浣衣母》中“公共母亲”“不可挽回的命运”沉坠,到后来《桥》冷寂的格调直至《莫须有先生传》过重“说理”对于文学感性的挤占,就表征了向虚无、厌世“偏至”的演变。李妈所处的乡土世界“内忧外患”,业已支离破碎,所谓“公共母亲”不过是社会性的生活假象,并不具备田园伦理的淳朴品质,相反,自私、爱讨点便宜、有点虚伪和小算计的精明构成明显反差(《浣衣母》);而十年造《桥》,似欲构筑“桃源”、引渡人生,却又屡屡突显坟墓、死亡一类意象,遍布人生的虚无阴影,人物虚化,风景也多半落寞、凄清,匮乏鲜活气息。至于《莫须有先生传》,随着愁苦现实、抽象说理的强化与彰显,“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5],不仅表明无法安放诗意的文学转捩,在普遍意义上,也意味着文学性的贫乏,“情趣朦胧,呈现灰色,缺少凝目正视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6],“站在毁灭因素的边缘”。废名诗歌也可视为感伤美学的跨文体实现。废名诗歌多作于1930年代,死亡、坟、镜子、幻梦等灰色意象的普遍,客观上表明了文学情感的悲观与消沉。“人生直以梦而长存,人生其如墓何”,人生如梦,逃不开死亡之墓的消解,“吁嗟乎人生”,人生的虚幻化入一句幽幽叹息(《墓》),“生之死之游戏”(《空华》),镜花水月的梦境终将破碎、幻灭(《妆台》),“我望着镜子一笑。我想我是一泪”(《沉埋》),“梦里的光阴,我知道这是假的”(《喜悦是美》)。废名一直未能摆脱这类情感的消极影响,竟至后来以“厌世诗人”自居,侵夺创作的文学性支点,“1947年后除偶见《莫须有先生传》的一些断片,再不见废名有什么小说创作了”,陷入“创作的终结”^[7]。

[1]方立天:《佛教哲学》,《方立天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第345页。

[2]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导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3]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4]刘勇、李春雨:《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5]周作人:《怀废名》,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八十年代》,[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1页。

[6]沈从文:《论冯文炳》,《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1页。

[7]凌宇:《从〈桃园〉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97页。

一般而言,农禅的质朴、自然似乎具备理想禅意的原生价值,而文禅的自我心性又有着超越困境的心理功能,二者的交汇无疑有利主体化解内、外世界的矛盾与冲突,催发禅意的诗化蕴味。然而事实却非如此。废名不仅难以维系农禅的淳朴诗意,也无法达至文人化的澄明心境,农禅伊始就处在下滑的轨道之上,而文禅虽欲填补农禅失落过程的诗意缺损,却无法挽救禅意失落的基本态势。废名小说的农禅诗意是有限的,即便最具农禅意味的前期小说也缺乏相对纯粹的诗性特征。《浣衣母》中小城已散布兵匪盗抢、捐税等社会性破坏力量,古朴、自足的田园伦理最终消散在李妈子亡女死、晚节不保的不幸遭际之中;《竹林的故事》三姑娘一家看似随意自然,却每每面对流言、闹市的侵袭,清静虚寂的背后隐现着死亡之下的落寞,孤儿寡母的无助、无奈,貌似“无心万事禅”的乡间生活,也并非单纯的“田园美”与“农家乐”。废名曾一度将此类小说看作“过去的生命的结晶”,声言“正如对着一位死的朋友,回忆他的生前,哀伤着”(《说梦》),或许就暗含这样深沉的伤恸。同样,在破损的乡土语境中,文禅也无法生成虚幻的诗化梦境。相反,文人想象激发了诗意凋零的感伤与挽歌格调,现实性损毁与破败逐步浮现为乡土悲情的外在表征,沉郁的悲愁、过重的思虑也扩散为引导叙述展开的内在意旨。在《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中,善感的文人意识不仅凸显人生的落寞,也展现了乡土的荒芜化:“人生下地是哭的”(《第一的哭处》),“人类便是一个陌生的旷野,路人无所凭吊”(《钥匙》),“好一个桃花源,看来看去怎么正是一个饥寒之窟呢”(《月亮已经上来了》),莫须有先生“不忍见人间的惨了,他不忍见人间的苦了,他不忍见人间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不忍见在‘死’未来以前‘死’简直是不可知,所以城内的许多人,都是劫后余生,在饥寒之中,在瓦砾之中,在恐惧之中,在求生中了!”(《这一章说到写春联》)。纤弱的文人心理撕裂了田园的淳静,普遍的苦痛凸显了诗情的沦落,过度哲思又加速审美感性的游离,诗意消散在“冰冷的理性”之中。

相当程度上,由农向文的禅风转化并未削弱文学情感的衰变。作为作家不同时期的审美选向,转向文禅,某种程度上就是农禅向文人心性退敛的结果,而文人禅的悲观、消沉乃至禅理异变,在消退文人诗情的同时,也意味着禅意无以维持的终局。由于精神的差异,“土气”的小农文化很难融进文人趣味,往往只是滋生文人想象的某些背景与资源,而文人传统借助个体心性的想象与体验,又无需深入乡土的文化实际,文人情趣多为游离现实的唯“心”之美,二者之间既没有获取超越对方的美学优势,也很难构成品性上的同化。由此,不仅农禅的和谐普遍处于消减之中,难以“抵挡”乡土困顿以及现代理性的“推敲”,而文禅也无法逃脱自身弱质个性的侵袭,常堕入文学诉求的困惑与迷误,转变中的禅风指向感伤美学的消沉退变。一定意义上,废名的诗作可视为“虚无”哲思的某种“过度”,同样彰显了诗化的背离。“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妆台》),“梦里的光明,我知道这是假的”(《喜悦是美》),“我的坟上明明是我的鬼灯,催太阳去看为人间之一朵鲜花”(《坟》)。梦、镜的虚幻与坟墓、死亡并无本质差异,“以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来分析,前一首妆台里面的镜子,与这一首小园里面的坟都是一个东西”(《妆台及其他》),触及人生本义的抽象洞察,淘洗着诗歌的感性体验,把诗歌转入了“哲学”,而从小说到诗作的意义“位移”,“意象”间的凝练“顿悟”有别小说相对零落、随意的体悟叙述,生命的虚无得以较为充分的展露。

三

不难发现,废名的禅意并不完全适用于理想主义的逻辑。作为一种以“澄怀观道”为理想境界的诗性文化,禅的基本特点在于超越日常生活的自由追求,诗意源于老庄自然主义的生活哲学与佛禅反求诸心的参悟之学,把返归自然的外在超越与明心见性的内在追求结合起来,形成主、客静寂的人生诗境。虽说有着农、文禅的差异性分化,但于此却是一致的。具体而言,农禅更多安身立命、“无智无

识”的本能成分,无须言教、权威的告谕,也不会局限于名数之内的知理束缚,以“平常心”做“无事人”的生活禅意,隐现着无为而治、逍遥自在的禅学思想,包含着对乡土自然本性的某种肯定;而文禅则因为融入文人风气,放大自我襟怀的审美体验,幽远的禅意契合了主体“心性”的自由向往与渴求,凸显乡土美学的雅致、形上品性,俗、雅之际的生存体悟,蕴涵生命理想的多重意义。显然,诗化禅属于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学构想,既需乡土保有相对稳定、和谐的世俗伦理,又要弱化、消减主体的心性矛盾与语义世界的文化冲突,维系审美诉求与诗学空间的精神同构与圆融,达成“经过禅宗哲学与美学净化过的日常画面”^[1]。

作为一种现代写作,废名的文学禅意不可能是传统禅学的单纯回响,这不仅在于禅作为一种古典性的宗教文化传统,“宗教情怀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2],现代乡土的普遍性毁损荡涤了田园色彩,散布“创伤性记忆”的文学世界不仅难以容留农禅的自然自足,也无法偏执虚幻的文人想象,诗化禅失去现实与美学的双重伦理支撑;而且对于现代文人的废名,禅意又关联知识分子情怀,探索“中国偏远农村普通农民原生形态的生活方式”^[3],“更多透着对现实文化语境的多元感知与思考,貌似传统的风貌背后实是现代文人的独特文学思考与表达”^[4],表明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思想诉求之间的深层次矛盾与冲突。作为中国静文化的代表,禅讲求“清明自性”,偏于虚寂的唯心体验与觉悟,相对封闭、稳定的文化品性并不具有“敞开”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与创造性,而废名“造桥”、“作船”或建造“公共花园”的诉求在于一种现代人生关怀,多样、“激烈”的社会因素涌动与文化焦虑必然突破禅的闲适、平和和“自性”。同样,废名文学过重的观念色彩也不利于传统禅意的保持,文学意义的理性思索突破了禅意空间的感官静谧性与伦理自足性。废名“从观念出发,每一个观念凝成一个结晶的句子”^[5],固然这与禅的觉悟有相通之处,不过传统禅悟在于理性直觉的“顿悟”,而并非观念性的思想认知与传达,“般若空观的理论基石,是否定名言概念有把握客观真理的作用”,“大都不需要逻辑思维的直接参与,甚至可以跟逻辑思维完全对立,而并不影响它们获得完美的实现”^[6]。由此,过重的理性识见导致禅风的异变也就是一种必然,禅“只教人顺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只教人安于生活,而不是创造生活”^[7]。与此相合,禅意的田园背景也不具备转化人生破损以及焦虑的诗化力量与机制。浣衣母的家破人亡、陈聋子的孤苦寂寞、小林的伤感虚无、陈老大面对病重母女时的悲哀无助,这些灰色生存际遇也都超出田园的限度;而随着禅风愈加“抽象”的演变,文学性的哲思逐渐陷入“形象与理性”的分裂,本应形象感性的文学世界趋向一种“观念的纯粹表现”,又有了“理障”的意味。诗作中的废名似乎也变化不大,抽象的诗意传达出一种智性美,纷杂的意象汇聚为“视觉的盛宴”,却将诗思过多散布于现实的失望与人生的虚无,在回归内心的寂寞中“反刍”梦境的虚幻,消沉的心理意象凝结成诗化禅思的障碍,“有限”的美学力量既不足以穿透现实文化压力,也难以参破观念的迷误,无从焕发诗意。

废名的禅意与现代文化存在精神性隔膜,同构性的缺乏在表明传统文化局限的同时,并未生成现代性的价值优势,当传统文化资源陷入现代思想的表述困境,引发了美学诉求上的普遍焦虑。一方面,诗化禅的悠远境界仍是作家所眷念与回顾的生存状态,并不因古旧、保守而失却魅力;另一方面,意图将禅一类传统诗性文化融入现代人生关怀,去弥合社会变革过程的文化落差与非诗化沉沦,“在

[1] 罗成琰:《废名的〈桥〉与禅》,〔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

[2] 吴洪森:《不死的火焰·序》,摩罗:《不死的火焰》,〔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 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前言》(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4] 席建彬:《废名田园小说中农禅与文禅的审美冲突》,〔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5] 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6页。

[6][7] 杜继文:《〈中国禅宗通史〉导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为世人构建一个桃源式的所在,又体现了融合传统、现代的美学意图。相当程度上,个性废名很难调和这一两难的审美选择,弱质的性格“带有女性化中国传统文人的过多遗传,又带有现代青年的苦闷色彩,所谓‘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1],”心理原型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2],一直放大着主体精神的困惑与迷惘,感触中国文学厌世文章的缺乏,伤情六朝、晚唐文人的落寞,对莎士比亚、哈代文学中的个性毁灭、悲观感伤也多认同,“世界观上的消极成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对现实不满而又看不到出路的废名,日益趋向于消极避世”^[3]。个中既不乏传统文人气度,也沉积着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焦虑,更渗透了对生命的普世性诗思。这份“繁复”的文学意味在于:作为一种诗化人生想象,已无法调和传统和现代,既无法固守自身,又难以真切进入对方;厌世出于此间感伤情绪的弥散及至向更为低沉的虚无情怀的滑落,诗意则源自理想主义消褪过程中审美自足因素的持留以及凋零的感伤氛围,表征出禅意的个性路径。废名并非那种个性通达的文人,游走在文学理想失落的边际,美学世界的矛盾与纠葛是一种常态,以致身为“文体家”的“几套笔墨”最终都无以调适,表现出禅风转变的“偏狭”一面。

文学禅意并不必然通向寂然禅境,目前研究尚不看重这一点,源于审美超越的意义预设,多视废名小说为“画境”、“桃源”、“田园牧歌”,忽视了差异性的禅风转化及其之于美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影响。而对于废名诗歌,多指出生存感悟与思索的智性特征,反而较少与禅关联,轻忽内在禅意的观念有所割裂与偏失,正如有论者所说,“废名诗歌的‘禅味’主要是阅读上,而不是写作上”^[4],禅又似乎“可有可无”。个体性的文学生产是一整体过程,不同时段之间多存有机关联,很难作简单化的切割,表征风格的“经典”作品与文类往往关联理想化的美学形态,可能并不体现风格生成、流变的过程性与差异性,而要清晰辨识一个作家的美学风格,需要一种互文性的系统考察。就诗化禅而言,并不限于诗化意义,具体到作品之中,情况又复杂得多,毕竟很少有人能做到“本心”的“静心遣荡”,去俯仰虚静空无的“大美”之境,而作为主体性的文学活动,自由自觉的精神也难被单纯固化。在跨文体方面,废名小说与诗歌也有着内在沟通,作为一种现代诗化写作,小说文体是“向诗倾斜”的结果,而废名又以写诗的技艺去写小说,诗歌也无法超脱小说情旨,终而缺乏禅意的濡染。很大程度上,借助禅风流变的整体观照,沿溯相关过程,不仅有助呈现废名创作的农业文化形貌,赋予文学世界“别样”的禅学图景,还有利呈现多元禅意之间的缠结、转化与演替等动态内容,在相对具体、深入的文化诗学框架中呈现禅意的复杂性与整体性,进至恢复作家文学风格的本真面貌。

农禅与文禅的精神差异,影响了废名文学禅意的生成与消退,如果说前者表明禅与“乡土中国”所滋养的小农文化意识的明确关联,那么文禅则沉积了过重的士文人趣味,又远离传统禅学的农耕经济基础。显然,农禅更具乡土生活的质朴意味,而文禅则指向生存体悟的雅化与抽象,农、文禅意的交织涉及了“俗雅”、“虚实”等文学性难题,诗学世界也必将面临审美选择与处理的转换、适应甚至歧异等复杂问题。沉陷其中,废名最终未能摆脱主体性的精神困顿以及文学世界的矛盾纠缠。

〔责任编辑:平 啸〕

[1]刘秉仁:《近十年废名研究述评》,〔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4期。

[2]朱光潜:《〈桥〉》,《冯文炳研究资料》,第179页。

[3]金宏达:《废名:从冲淡、古朴到晦涩、神秘》,《冯文炳研究资料》,第262页。

[4]高玉:《废名诗歌新论》,〔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